

# 詩經鑒賞辭典

安徽文藝出版社



典新貴鑑詩

子聖



诗经鉴赏辞典

主编 金启华 朱一清 程自信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0 插页: 2 字数: 900,000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0,000

定价: 15.00 元

ISBN 7-5396-0179-5/Z·3

主 编 金启华 朱一清 程自信

撰稿人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国玺	叶 华	阴法鲁	刘学楷	刘文忠	刘 宁
许振轩	孙以昭	朱一清	朱世英	纪作亮	何满子
陈贻焮	陈祖美	陈怀良	陈耀东	陈友冰	汪大白
李 泉	李谷鸣	吴企明	吴恩培	吴孟复	林 庚
金启华	金小平	张永鑫	张采民	胡家祚	袁行霁
袁传璋	殷 翔	郭全芝	徐定祥	黄季耕	曹道衡
董治安	蒋见元	蒋立甫	程俊英	程自信	程扶颢
谢再斐	蒲金洲	褚斌杰	谭家健	蔡厚示	

责任编辑 许宗元

---

## 出版说明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世界上最早的诗集之一。本社约请国内著名学者、古典文学专家、专业工作者撰写鉴赏文章，成此书。诗无达诂，本书诸文可备一说。译诗与注释力求准确、生动。版本择善而从。

承蒙诸专家、学者赐稿，谨此深致谢忱。本书部分地采用了著名学者的译诗，在此谨向诸先生致谢。

因水平有限，经验不足，书中舛误在所难免，尚祈专家、读者指正。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

## 凡 例

一、本书将《诗经》305首诗悉收入。每首都配有白话译诗。原诗居左，译诗居其右。译诗凡采用已发表（出版）者，均注明“采用某某某译诗”；凡未注者，译诗作者则为该鉴赏文章的撰写者。

二、本书原则上采用一首诗一篇鉴赏文章，个别为合并赏析。撰写人名署于文后。

三、本书注释原则上作词注。难读的字用汉语拼音注音。

四、本书使用简化字。必要或特殊情况下，酌用繁体字或异体字。

五、本书附录有二：《诗经学常识》；《历代〈诗经〉研究著作目录》。

## 前 言

金 启 华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诗集之一。它原名为《诗》，或称《诗三百》。汉代尊之为经，现在不过是沿袭旧称，作为书名而已。它的编集成册，大约在公元前六百年左右。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聘鲁请观周乐的故事，他所听到乐工演奏的诗歌次序和现行本的《诗经》编排次序大致相同，只是《豳风》、《秦风》是在《魏风》、《唐风》、《陈风》的前面。而“自邶以下无讥焉”，可能是他认为《邶风》、《曹风》没有评论的必要，但《邶风》、《曹风》该也在编册之内的。

《诗经》所反映的历史时代，自西周初年起到东周春秋中叶，也即公元前一千一百年到公元前六百年左右，为五百年的歌唱。其中个别篇章所写到的内容，如《商颂·玄鸟》中提到的契，《大雅·生民》中所描写的稷，又远涉到中国上古传说时期帝喾、帝尧时代的事，为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左右了。

在世界诗歌中，公元前一千一百年到公元前七百年间，希腊荷马时代有《伊里亚特》、《奥德赛》两部史诗，稍后，希腊又有女诗人萨敷写下一些抒情诗。巴比伦有《吉加美什》史诗，约与此同时。公元前十世纪，印度有《摩诃波罗多》、《那摩延》长篇史诗。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早期文化发达的国家，它们都是叙事诗较早出现，宗教的色彩很浓，且多系写英雄人物，并具有神奇气氛。我们的《诗经》则是一部抒情诗，描写

现实，多写人的生活，并富有人情味，是比较清醒的。这些远古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名篇，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几千年来哺育着后来多少著名的诗人，这该多么值得我们珍视。我们祖国以有这部《诗经》屹立在世界诗歌领域里，放出它的异彩而自豪。

《诗经》中包括着风、雅、颂三个部分。风诗中有十五国国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雅诗中有小雅、大雅，颂诗中有周颂、鲁颂、商颂。风诗一百六十篇，雅诗一百零五篇（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颂诗四十篇（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一共三百零五篇。这种分法，大约和当时的音乐区分有关。国风是地方音乐，雅是周人所谓的“正声”（朝廷之音），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其中国风产生的时间最长，占诗经所反映的整个时代，周颂产生于西周前半期，大雅产生于西周，小雅产生于西周末至东周初，鲁颂、商颂产生于东周春秋时期。

《诗经》产生在这一时期，其社会原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恩格斯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反杜林论》）恩格斯这里指的是希腊文化，我们可以引用它来说明《诗经》产生的有利条件。周代的灿烂文化，是建筑在广大奴隶的辛勤劳动基础上的，根源于奴隶们的斗争生活。其所在地区，又是所谓“周原膋膋，萑茶如飴”（《大雅·緜》），土地条件相当优越。奴隶们担负生产的重担，促进生产，这种历史劳绩，首先应该为我们所重视。周灭殷以后，在手工业方面又有更大的进展。今天从地下发掘的大量周代青



铜器来看，可以明显地看出殷代青铜器工业为周人所采用而又有所提高，使周代的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较大规模的分工，并为文化发达创造了条件。恩格斯又说：“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反杜林论》）西周奴隶社会所形成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使意识形态趋于完整，它在政治措施上推行宗法、等级、分封等制度，按照所谓亲疏、尊卑、贵贱等区分来维护统治，除以刑罚来镇压奴隶的反抗外，又用神道设教，借助于上天、上帝、天命、鬼神等，来恐吓、欺骗人民。

周代奴隶主贵族继承商代的“天命”思想，提出了所谓“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的问题，更认为天命有归，“我道唯宁（文）王德延”（《尚书·君奭》），强调文王以德政而有天下，又称：“文王涉降，在帝左右”（《大雅·文王》），宣扬文王死后的在天之灵，必须敬之以礼，这样，以“德”和“礼”来使国家强化，以便于他们的统治，并且把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作为奴隶社会的统治思想。

还有，殷遗民对周代文化也起了某些影响。《诗经》里曾反映殷遗民来周助祭的事实，所谓“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大雅·文王》）《尚书·多士》更详细地说明周王朝把殷遗民迁到西方，是“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又称“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又说“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这是要殷多士保留的典册，应当继续为周王朝来效劳。事实上，殷多士在周初的文化发展

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文学本身的发展，对《诗经》也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殷墟所发现的甲骨文来看，中国文字到这一时期已经成熟了。再就甲骨所刻划的卜辞或其他片断来看，也有了记事或抒情的短篇。到西周时期，文字更成熟，书写更方便，为《诗经》的书写提供了直接有利的工具。《诗经》就是在这些社会条件下产生的。

《诗经》三百零五篇，包括着民歌和奴隶主阶级的作品两大部分，所反映的生活面是相当广泛的，某些诗篇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从描写的内容来看，国风是较多地反映人民生活兼及其他方面，小雅写人民生活、奴隶主下层生活和奴隶主贵族生活，大雅与颂大都写奴隶主贵族生活。从思想性、艺术性来看，国风、小雅是比较高的，“实则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颂》诗早已拍马”，（鲁迅《文学上的折扣》）歌颂奴隶主阶级的祖宗功德。

《诗》自产生以来，据《左传》、《国语》等史书记载，在春秋时代，便广泛地为各国诸侯、士大夫所引用，在不同场合里，表达他们的意志和感情。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公子重耳流亡到了秦国，“公（穆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又如《左传·成公二年》记晋、齐的鞞之战，齐师战败后，使宾媚人和晋大夫谈和，晋大夫“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为条件，而宾媚人说：“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

‘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这一番外交辞令，引了很多《诗》句，终于完成这次和约。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晋楚各国大夫在宋国会盟，后来，“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太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于是，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贄贄》，子西赋《黍苗》之四章，子产赋《隰桑》，子太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赵孟对这些诗和人都有议论。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晋国叔向因为其弟羊舌虎的牵连被囚，他称述己志，就引诗说：“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表示无罪而被囚，自己满不在乎。又引诗说：“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希望“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祁奚救他，祁奚果然向范宣子说明叔向被囚真相。说叔向的才德是能“惠我无疆，子孙保之”。也是以诗见意。又《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郑子产劝范宣子轻币而重“令名”和“德”，说：有德则乐，乐则能久。然后引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认为这是“有令名也夫。”这些都说明各国大夫以诗言志，借诗来帮助解决问题。还有《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的事，郑伯和母亲决裂了，后来颖考叔设谋使郑伯与其母和好。作者以君子的口气，引诗称赞颖考叔说：“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以诗来为颖考叔作结论。又如《左传·隐公三年》记周郑交质的事，作者也是以君子的口气，说：“《风》有采芣、采芣，《雅》有行苇、洞酌，昭忠信也。”说明“交质”的不足信。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诗》在春秋时期，无论是朝会、盟约；无论是抒情、写意；无论是论史、评人以及其他各项活动，

都被广泛地引用。

《诗经》里反映人民生活的诗篇，《风》《雅》中较多，写阶级矛盾，深刻具体。我们知道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阶级矛盾的基础上的。奴隶主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及其他生产资料；还占有劳动者本身——奴隶。奴隶则象牛马般地劳动，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这在《诗经》里都有所描绘。周代奴隶社会的最大奴隶主——周天子，拥有土地和奴隶，是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而具体地写到他们占有土地和奴隶的情况，则是：“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周颂·噫嘻》）还巧取豪夺：“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大雅·瞻卬》）其土地则是“大田多稼”、“播厥百谷”（《小雅·大田》），种下各种庄稼，驱使大批奴隶，“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周颂·载芟》）等到收获时期，奴隶主则是：“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小雅·甫田》）而奴隶们的生活，则是“无衣无褐，何以卒岁”，“采荼薪樗，食我农夫。”（《豳风·七月》）由于强迫劳动，奴隶们对劳动没有兴趣，但又不得不去劳动。《七月》描写了农村的全部劳动生活，男男女女，一年四季，早早晚晚不停地劳动，对耕种、采桑、摘菜、养蚕、纺织、染丝、打猎、砍柴、筑场、酿酒、凿冰、盖屋……等，都作了具体的描绘，写奴隶们一年到头的劳动，是“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蚕月条桑”，“八月载绩”，接着是：“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这样周而复始，劳而无获，再加以奴隶主的无情的压迫和

剥削，必然引起奴隶们的愤怒、斥责、反抗，质问那“不稼不穡”，“不狩不猎”的奴隶主，为什么却拥有“三百廛”、“三百亿”、“三百困”的禾呢？更直接地道出：“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伐檀》）

奴隶们又把奴隶主比作贪婪的田鼠，表示对他们的憎恶和弃绝，而要逃亡出去，寻求自己的“乐土”、“乐国”。如《魏风》中的《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实际上，在当时的条件下，哪有什么乐土、乐国？即使到了外邦，也仍然遭遇同样的命运。因此，在其他的诗篇里，奴隶们又揭露了那些残暴的情况，如所谓“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小雅·黄鸟》）

奴隶们又控诉奴隶主使他们行役四方，奔波在外：“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小雅·何草不黄》）“武人东征，不遑朝矣！”（《小雅·渐渐之石》）由于行役在外，自然不得侍养父母。他们控诉着：“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唐风·鸛羽》）而家人更怀念他们：“终朝采蓝，不盈一襜。五日为期，六日不詹。”（《小雅·采绿》）“期逝不至，而多为恤。”（《小雅·杖杜》）

这些诗篇，构成一幅人民疾苦生活的图画，表现出人民对当时政治的不满，是《诗经》里思想性比较强的作品，它们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为后代的进步诗人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人民的爱情活动，在国风里有较多的描绘，小雅里也有一些。这些诗篇的存在，使得后来封建学者感到头痛。他们抹煞不了事实，只好对这些诗篇作出歪曲的解释，什么“关雎，后

妃之德也”哪！“国风，好色而不淫”哪！实际上都是不正确的。我们看这些诗篇，有的倒能表现出人民健康的感情。“当事双方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因此，他们的相思慕念，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对爱情的坚贞，是值得肯定的。如《邶风》中的《北风》，《郑风》中的《出其东门》，《小雅》中的《隰桑》等篇。他们道出：“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郑风·出其东门》）“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小雅·隰桑》）

可是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中，是谈不到什么爱情自由的，相反地是受到压抑和阻挠，而受压的又是女性占多数，但她们反抗也最坚决。她们热恋着对象，就不顾亲人们和习俗的阻挠，大胆道出：“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邶风·柏舟》）而大胆地自找对象，道出：“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召南·摽有梅》）他们为着青年的幸福的爱情生活而斗争，当他们得着这些幸福的时候，自然唱出：“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蔣兮蔣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郑风·蔣兮》）但是在奴隶社会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表现在男女关系上，则是女子遭到男子的始乱终弃，因而发出痛苦的控诉，如《邶风》中的《谷风》，《卫风》中的《氓》，《小雅》中的《我行其野》等，是：“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

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卫风·氓》）“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旧姻，求尔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异。”（《小雅·我行其野》）这些不幸的遭遇，具有深刻的社会性，使我们认识到阶级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和对爱情生活的摧残。

而在另一方面，则又是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如《陈风·株林》所揭露陈灵公的淫乱，是“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揭露齐襄公的无耻行为，有《齐风》中的《敝笱》、《载驱》、《南山》等。这使我们看到统治阶级的虚伪和丑恶，和人民的健康的朴挚的爱情生活是有本质的不同，也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次，《诗经》里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诗，在大、小雅里比较多，所揭露的黑暗是比较深刻的。从朝廷揭起，揭露天子的昏暴，大臣的专横，以至社会动乱和人民疾苦。周王朝自昭王、穆王以后，日渐衰微。加以厉王的贪婪暴虐，幽王的荒淫无道，政治黑暗，下层官吏怨愤，在诗里都有具体的描绘。如呵斥厉王的各项罪恶行为，指出他是“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大雅·荡》）又说他是“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大雅·抑》）这个荒暴的奴隶主头子，又任用一批爪牙，为他压榨，为他搜刮，所谓：“曾是疆御，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愆德，女兴是力。”（《大雅·荡》）幽王则内宠艳妻，外与大臣狼狈为奸，诗人道出：“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为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楛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小雅·十月之交》）又叫那个“尹氏大师”来“秉国之均”。诗人斥责他不公平，责问他“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小雅·节南山》）又控诉他们的掠夺，占有，滥用刑罚，是：“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

女复说之。”（《大雅·瞻印》）

这些虐政的结果，在厉王时期，是“女魃恫于中国，斂怨以为德。”“内戾于中国，覃及鬼方。”（《大雅·荡》）而人民痛苦，庄稼歉收，情况是：“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降此蠹贼，稼穡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大雅·桑柔》）

到了幽王时期，发生了骊山之难，所谓：“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小雅·正月》）诗人归咎于女子造成西周的灭亡，当然是片面的，不过当时的情况，是：“踧踧周道，鞠为茂草。”（《小雅·小弁》）人民更是痛苦不堪，是：“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瘵我饥馑，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大雅·召旻》）

奴隶主阶级下层人士忧谗畏讥，对天发生怀疑，对人事多所指责，道出：“黽勉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

有的诗篇则为人民的疾苦发出呼吁，是：“民亦劳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逯。无纵诡随，以谨昏恟。式遏寇虐，无俾民忧。”（《大雅·民劳》）

奴隶主阶级的下层官吏，又控诉奴隶主上层统治者对他们差遣不公平，所谓：“大夫不均”，因而“我从事独贤”。他们是：“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小雅·北山》）更具体地控诉那不公平的现象是：“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同上诗）

这些诗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现实的真相，揭露



了政治黑暗，而祸乱都是由上层统治者挑起的。所谓“乱由上作”，使人民生活痛苦，使奴隶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暴露了周王朝的没落过程，预示着奴隶社会的必然崩溃，这是有一定认识意义的。

再次，我们看到《诗经》里描写周王朝及其祖先兴起的历史。这些诗篇，有的具有神异色彩，有的是夸耀功德，但实际上保留了一些母系氏族社会的面影，描写了周部族与外族的斗争以及周王朝的兴衰过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大雅·生民》写周代始祖后稷诞生的奇异及其对农业的贡献。他是姜嫄“履帝武敏歆”，因之“载震载夙，载生载育”，而“时维后稷”的。所以姜嫄不敢养他，把他抛弃，但弃而不死，是：“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訐，厥声载路。”接着写他种各种庄稼，是“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麦幪幪，瓜瓞嗶嗶”。种谷种得有方法，有成绩，因而在邠地成家立业，等等。在实际上是从侧面反映出那时人民对农业生产技巧的掌握，而周王朝的兴起也是从这儿奠基的。

后稷在邠地立国以后，到了他的曾孙公刘又迁都于豳。在《公刘》诗里，又有较详细的描绘，从准备起程到相地形、建京邑、宴群臣、分田亩、定居宅，等等，都涉及到，诗的气氛是乐观的，所谓：“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迺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岵，覆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公刘迁豳以后，到了古公亶父又迁到岐下，是“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大雅·绵》）这次迁居则是由于狄人的入侵，古公亶父因而开辟新的地区，使周家发达起来。《绵》诗描写了迁居、授田、筑宫室；也写了周家和